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邓中夏

# 思想研究

杨 军◎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邓中夏思想研究

杨 军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中夏思想研究/杨军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601-4732-1

I. 邓… II. 杨… III. 邓中夏(1894~1933)—政治思想—  
研究 IV. K827.6 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3111 号

书 名: 邓中夏思想研究

作 者: 杨 军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子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68 千字

ISBN 978-7-5601-4732-1

封面设计: 创意广告

长春日升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

2009 年 8 月 第 1 版

2009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mailto:jlup@mail.jlu.edu.cn)

——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华诞

## 前 言

邓中夏(1894—1933),原名邓隆渤(又名邓康),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

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sup>①</sup>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于是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的问题。邓中夏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在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国民》杂志、建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等一系列斗争实践中,又加深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对后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中夏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向工人学习,不断改造自己,使之逐步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列宁指出:“谁要是仅仅

---

① 关于邓中夏筹备了党的一大会议而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其原因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选举一大代表时,邓中夏曾是候选人之一,但邓中夏将要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出席7月在南京召开的会议。在选举他为代表时,邓中夏以工作忙不能分身而推辞了。虽然当时各地已经有了一些党的组织,并开展了活动,但基本上是力量分散且无统一协调的领导和行动。因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党的成立大会是要集合全中国最先进分子,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并通过共产党得到社会主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使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从这一点来说,邓中夏虽有不能参加会议的理由,但从根本上看,是对党的一大会议的召开认识不足,这真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邓中夏践行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中,与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1920年10月,邓中夏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表明他已经由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中夏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早地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他本人的影响自不必说。也是中华民族开始觉醒的先声,是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由自在向自为转变的先导。他的转变是通过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来实现的,把工人运动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努力探讨革命真理,有了不少合乎历史唯物论的思想。五四运动前夕,在以往的思想认识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的斗争实践中,他进一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了自己参加阶级斗争实践的经验教训。同时,他和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就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得到了他们的启发和帮助。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研究、思考和艰难曲折的探索,邓中夏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同中国工运相结合的杰出典范。并把自己锻造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邓中夏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工人运动是从长辛店开始的,毫无疑问,邓中夏是开拓者。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大部分时间是组织、指导工人运动。他参加创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是第一、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劳动大会宣言、决议的起草者,劳动立法运动的倡导者,上海五卅运动的发动者之一,省港工人大罢工的总顾问。邓中夏对工运理论作出了杰出贡献,其工运理论成为指导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邓中夏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领导

权、中国革命的动力以及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等都提出了独特见解,为构筑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邓中夏通过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最早认识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老实说罢,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并且最先提出了“我们需要用最大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争此领导权”,领导权的实质就是哪个阶级“能够领导中间阶级,即取得中间阶级群众的问题。中间阶级即农村的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取得这两个群众,那末领导就是资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取得这两个群众,领导当然也是归无产阶级,所以我们与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就是争取中间阶级群众的问题”。这样,就进一步把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具体化了。同时,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错误。

此外,邓中夏关于青年运动、农民运动、新文学运动、新闻编辑、“外交”战略等思想,都具有独特的见解,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中夏关于收回香港的设想,是在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还没有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并执掌全国政权的前提下提出来的,这在党的早期卓越领导人当中是最早的,实在是难能可贵!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邓中夏思想的体系。

本书对邓中夏思想的研究,力求做到实事求是,把邓中夏及其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其思想的形成和思想内核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力求获得较全面的认识。以期对邓中夏及其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 目 录

<b>第一章 邓中夏的早期思想及发展脉络</b>	
一 邓中夏思想诞生的时代历史背景及理论来源·····	3
二 反帝爱国思想·····	15
三 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22
<b>第二章 邓中夏的哲学思想及实践运用</b>	
一 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反对照抄照搬的“食古不化” ·····	40
二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工人阶级要与世界劳 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	45
三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无产阶级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 ·····	49
四 政策与策略的思想·····	55
<b>第三章 邓中夏与新文化及理论的探索</b>	
一 教育思想·····	68
二 邓中夏与新文学运动·····	78
三 新闻编辑思想·····	92
<b>第四章 邓中夏的工运思想</b>	
一 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	103
二 关于工会组织的原则·····	111
三 工人阶级需要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	136
四 工会组织对敌斗争的策略·····	141
五 领导劳动立法运动的开展·····	151
六 “外交”思想·····	159



---

<b>第五章 邓中夏的民主革命思想</b>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	172
二 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178
三 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181
四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	189
五 青年运动与农民运动·····	207
六 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	224
七 政权建设思想·····	235
八 关于收回香港的设想·····	247
<b>第六章 邓中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及历史贡献</b>	
一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	259
二 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 群众基础,提供了组织保障·····	262
三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最早提出 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大理论贡 献·····	265
<b>邓中夏年谱</b> ·····	273
<b>主要参考文献</b> ·····	297
<b>后记</b> ·····	298

## 第一章 邓中夏的早期思想及发展脉络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历史发展的呼唤和社会演进的产物。在中国革命史上，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才辈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决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剧烈演变和深重的民族危机造就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湖南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与代价，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全省为此而英勇献身并已正式认定为革命烈士的达十万多人，涌现出了众多的功绩卓越的革命家。1955年授勋时，全国10位元帅湘籍占3人，10位大将湘籍占6人，57位上将湘籍占19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何叔衡、刘少奇、任弼时、向警予、夏明翰等一大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名字，将成为永远的丰碑，名垂青史。

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讲，湖南这片热土之所以能够养育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这样的不朽人物，也得益于湖南独有的乡土文化——湖湘文化，得益于这种文化所凸现的一种精神——“湖南人的精神”。杨昌济认为：近百年来，“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因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sup>①</sup>

近代以来，湖南一扫沉闷空气，朝气蓬勃，人才辈出。维新运动兴起，湖南颇得风气之先。作为戊戌六君子中最为激进的领袖人物，谭嗣同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sup>②</sup>的献身精神，成为我国近代为变法

①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②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2页。

维新而流血的第一人。自立军起义的首领唐才常，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代代为人传颂。爱国将领蔡锷，以“再造共和”而彪炳史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首先响应孙中山的是黄兴领导的华兴会。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时，湖南籍会员为各省之冠。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道一、蒋翊武、谭人凤等不愧为推翻帝制的功臣。无产阶级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后，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等一大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涌现出来，令人刮目相看，应接不暇。这一现象决非偶然。正如杨昌济所言，确与湘省学风存在密切的关系。湖湘学派自问世以来，十分强调经世实用，不尚空谈，重视实践，提倡力行。正是在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风骨熏陶下的邓中夏从投身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以“忧国忧民”为己任。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说可说是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实写照。

邓中夏作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的一员，又恰恰诞生于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结点——1894年。<sup>①</sup>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社会最黑暗最动乱和人民生活最痛苦的时候。也是中国社会面临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时势的驱动下，生于中国社会面临大变革时期的邓中夏，随着历史的演进，抱着对理想和真理的追求，投身于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实践着救国救民的信念。在对各种思想、理论的反复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用以挽救中国的武器。形成了他的早期革命思想，他的社会改造问题、<sup>②</sup>平民教育、反帝爱国等救亡中国的思想是按照早期民主主义者，到激进民主主义者再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轨迹演进的，最终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并为中国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因此，邓中夏的思想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孕育、发生、成长、成熟一样，都是在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的时代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

<sup>①</sup>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廷卖国投降及我国经济技术落后，最终导致战争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sup>②</sup>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在中国的传播的影响下诞生的。总之,是具有极其深刻而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的。

## 一 邓中夏思想诞生的时代历史背景及理论来源

19世纪中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侵略的全面加剧,本已走上下坡路、步入衰老期的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更加黑暗腐败,封建经济更趋衰落贫弱,封建传统教育越益空疏、腐化、没落,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为了救亡图存,从鸦片战争前到甲午战争后,一批又一批爱国的有识之士,奋起大声疾呼,掀起了要求进行社会变革的浪潮。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龚自珍就针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发表了著名的《平均论》,尖锐地揭露了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指出:“其时,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阨,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吝惜,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病,生民用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sup>①</sup>龚自珍认为,要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严重危机,唯一的出路就是“更法”,“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矫之而不过,且无病,奈之何不思更法?……删去文法,捐除科条,裁损吏议,亲总其大纲大纪,以进退一世,而又命大臣以所当为,端群臣所当从。……万万世屹立不败之谋,实定于此。”<sup>②</sup>

与龚自珍同一时期的魏源对鸦片战争的失败深感痛心疾首,愤而于1842年编撰成《圣武记》,宣扬清初的武功,激励人心。在此基础上,他又扩展林则徐翻译的《四洲志》,几经增补,编撰成一百卷的《海国图志》,于

① 《平均论》,《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页。

② 《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36页。

1849年刊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sup>①</sup>的思想。他认为,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就必须效法俄国彼得大帝向外国学习的精神,要提倡科学技术,开设工厂,建立新式交通工业,制造器械,要准许民间自办新式工业,并鼓励自由贸易。他坚决主张向西方学习,学习外国人的长处。针对当时顽固派把一切西学都视为“奇技淫巧”的滥调,他指出有用的西学乃“奇技而非淫巧”,应该学习这些“奇技”,而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sup>②</sup>他深刻地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马关条约》是一个划时代的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条约内容不仅规定将台湾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使中国的大片领土沦为日本殖民地,而且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当时年收入的三倍,其数额比鸦片战争以来历次赔款都大得多。同时条约还规定日本臣民可以任意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开设工厂,从事各项工艺制造,所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sup>③</sup>

《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开始由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由以往的蚕食边疆发展到把魔爪伸进内地来掠夺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急剧加深,全国面临被瓜分而沦为殖民地的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甲午战争后,1895—1899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侵华并企图瓜分中国的狂潮。

19世纪末,世界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当资本主义发达到帝国主义的时候,不得不向海外找殖民地。”<sup>④</sup>为了寻求更多的资本输出场所,在世界殖民地已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它们更加注目中国。甲午战争后,借日本通过武力侵华获取大量权益之机,各帝

① 《海国图志·叙》。

② 《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二十四,第2页。

③ 李佩,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0页。

④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国主义国家也都变本加厉侵略中国。除急剧增加工业产品输入外,它们竞相加紧对华资本输出。其方式主要有:给予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设立银行、举办工厂、开采矿产、修筑铁路等等。为了保护各自的垄断性权益,帝国主义列强还进一步要求并实施在中国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3月,德国通过《中德胶澳租界条约》,首先把山东作为独占之地;沙俄则紧随其后把东北、内蒙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为北抗俄国,南拒法国,强行“租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并强迫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各省与两广部分地区“不割让他国”,法国则于1899年底最终取得了自己在两广和云南地区具有独占性的特殊权益。日本也趁火打劫,于1898年4月,强迫清政府同意将福建省及沿海岛屿作为它的势力覆盖之地。各列强在中国疯狂抢夺权益和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竟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为了缓和矛盾,分享侵略利益,它们又互相勾结,达成了彼此承认各自“势力范围”的所谓谅解,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来满足共同的侵略欲望。美国其时因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无暇顾及侵华,但后来提出了更阴险的“门户开放”政策,使各帝国主义国家更结成了一个侵华同盟。帝国主义列强在19世纪末,加紧对华输出资本,“国际帝国主义一面摧毁中国的手工业与农业,一面又阻止中国实业的发展。”<sup>①</sup>特别是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活动,标志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险恶形势初步形成。这就使中国人民面临巨大的灾难,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这五十多年间,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文化教育,各方面都一步一步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压迫控制,其侵略势力从中国沿海沿边伸展到中国广大内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迅速、显著、全面地加深,方方面面都由此而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演变,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压迫实在太猛了,使得中国不能不起一种‘自强御侮’的反感。”<sup>②</sup>为挽救

①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②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提出了“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sup>①</sup>企图在不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变法使中国强大起来,康有为同时指出了中国危机的周边环境,“俄北瞰、英西睽,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sup>②</sup>梁启超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阙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sup>③</sup>即使如此,这场维新变法运动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很显然,失败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维新派以炽热的爱国激情和追求近代化的革新思想,期望通过合法手段,依靠毫无半点权力的光绪皇帝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结果以失败告终。历史经验表明,在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历史的规律是不以维新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推行君主立宪,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还能获得成功。那么,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社会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勾结,形成强大的反动势力的条件下,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则必然为中外反动势力所不容。

《辛丑条约》签订后,民族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清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各种压力下,企图以“自强新政”和“预备立宪”缓和矛盾,消弭革命。其宗旨不外是加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加强君主权力和国家军队,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作出某些让步。结果是使国家政权进一步半殖民地化,社会经济进一步半封建化。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革命政纲,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奋斗目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40页。

② 康有为:《强学会叙》,《戊戌变法》第4册,第384页。

③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

标。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 268 年的清王朝,而且埋葬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曾一度给中国人民带来新希望,为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当人们沉醉于建立民国的凯歌声中,风云骤变,封建军阀袁世凯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步步进逼,胁迫革命党人妥协。最后,革命党人以清末代皇帝退位,实行共和为条件,向袁世凯交出了革命政权。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理人袁世凯窃取,致使民国徒有虚名。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曾沉重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sup>①</sup>

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加剧了人民沉重的负担。全国陆军 1914 年为 45.7 万人,1919 年增至 138 万人。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约占财政支出的 70%。<sup>②</sup> 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支付对外国的“赔款”和外债本息,北洋军阀不仅保留了清政府的全部捐税,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税。各种附加税更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几乎无物不课,无处不征,甚至实行田赋预征。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虽然有所区别,但都未能从根本上结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两者的主要区别:一是政纲和奋斗目标不同,前者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属革命运动;后者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属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二是斗争手段不同,前者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后者是用改良手段,变法维新。三是在近代史上的历史功绩不同,前者推翻了封建专制,后者推行的君主立宪却陷入流产。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实际上都是试图实现中国近代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都以失败而告终。

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再次表明,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在中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99 页。

<sup>②</sup> 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4—165 页。



国受若干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已经确定的历史条件下,在这种帝国主义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相互勾结而形成的强大的反动势力压迫下,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革命暴力手段,把皇帝拉下了马,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走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但未能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这是由中国近代国情和世界历史时代所决定的。

国情的区别与社会发展道路息息相关。从国情出发,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选择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革命事业则有可能成功。脱离国情,凭主观臆念选择革命道路,则必然遭到破产与失败的厄运。

社会政治的实际状况使人们对充满希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理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如同梁启超所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厌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sup>①</sup>这使得人们普遍感到不满和担忧,问题在哪里,应该怎么办?旧的理想破灭了,新的希望在哪里?“茫茫前路无归处,暮风秋雨江上舟”<sup>②</sup>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和对国家前途渺茫的苦闷。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形成了必要的思想氛围和嬗变的文化因子,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壮大,反映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也在孕育着新的因素和新的变革。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尽管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始发生了,但真正发生质的变化,从根本精神上接受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得

①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词》,《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第80页。

② 宁调元:《秋兴用草堂韵》。